

艺术与思想史丛书

伍晓明◎著

吾道一以贯之： 重读孔子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

伍晓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吾道一以贯之: 重读孔子/伍晓明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301-05887-X

I. 吾… II. 伍… III. 孔丘 (前 551 ~ 前 479)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8992 号

书 名: 吾道一以贯之: 重读孔子

著作责任者: 伍晓明 著

责任编辑: 谢茂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887-X/B·024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国民灰色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机室

印 刷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开本 10.25 印张 28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

◆ 魏晋玄学史

◆ 世袭与禅让 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传说

◆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

◆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篇 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

艺术与思想史丛书

封面设计：毛淳

目 录

绪论：重读孔子.....	(1)
一、“重”读孔子	(1)
二、重“读”孔子	(13)
三、“吾道一以贯之”：他人或他者	(19)
四、来自他者“的”启发	(27)
第一章 “人（之）间”之仁——从“己欲立而立人” 到“仁者，人也”	(30)
一、别仁于圣	(32)
二、己欲立“而”立人？	(36)
三、己之为己	(41)
四、第一人称代词“我”与“己”	(46)
五、己之欲立	(52)
六、己立“而”立人	(58)
七、师的意义：在立人中立己	(63)
八、“人（之）间”之仁.....	(65)
九、仁要求仁：仁的两个层次或者两个层次的仁	(74)
十、“先（于）天”之仁.....	(81)
十一、“近取譬”与作为人的理想的仁.....	(88)
十二、仁：人的重复	(91)
十三、一个只有范例的文化	(97)
十四、“不仁”、“非人”、“吃人”	(103)
第二章 重读“克己复礼为仁”	(109)
一、致敬于他者：探求“礼之本”	(111)
二、“恭敬之心，礼也”	(117)

三、礼（之）分：作为语言而活动的礼·····	(122)
四、恭敬的“本质”·····	(127)
五、“亲亲之杀[差]”：礼的结构性“起源”·····	(135)
六、“恭”何以“近于礼”？·····	(140)
七、向他者“超越”：“克己”与“复礼”·····	(145)
八、“为仁由己”：他者“的”发明·····	(155)
第三章 重读“孝悌为仁之本” ·····	(158)
一、引言 孝的分析：从政治回到伦理·····	(158)
二、孝之敬：“自然”感情或者人的“本质”？·····	(161)
三、父母：我与“第一”他人的“第一”关系·····	(167)
四、父母的“后事”：我的“终极关怀”·····	(170)
五、哀悼的意义：“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176)
六、“祭‘如’在”：与“鬼神”一起生活·····	(179)
第四章 忠于/与他人 ·····	
——重读孔子关于忠的思想·····	(183)
一、忠的结构分析：将自己“给予”他人·····	(184)
二、保证与许诺·····	(190)
三、最“原始”的信·····	(195)
四、信与忠·····	(200)
五、“一厢情愿”之忠与成为伦理主体·····	(204)
六、愚忠的可能性·····	(208)
七、两种他者和两种责任·····	(211)
八、“殷有三仁”的意义·····	(215)
九、忠的革命和革命的忠·····	(216)
十、忠于他人“的”主体与主奴结构·····	(219)
十一、忠、勇、仁·····	(222)
第五章 爱与他人 ·····	
——重读孔子的“仁者爱人”·····	(225)
一、引言：“爱人”之谜·····	(225)
二、“爱之欲其生”的“爱”·····	(227)

三、爱之惜与惜之爱	(229)
四、爱与好	(230)
五、“让”他者“生”与“爱/惜”他者	(232)
六、“爱人”：我对他者的根本性关切	(236)
七、作为伦理命令的“爱人”与成为“主体”	(238)
八、孔子的“爱人”与康德的“互爱”	(241)
九、爱与“天地一体之仁”	(243)
十、仁的“欲望”：“一体”之“间”	(246)
十一、余论	(248)
第六章 重读“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250)
一、“出门如见大宾”	(251)
二、“使民如承大祭”	(258)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65)
四、“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269)
第七章 “异性”（的）“她者”：孔子的女子与小人	(276)
一、他者（与）未来	(277)
二、“我我”与“毋我”	(278)
三、男性君子的“他/她者”	(280)
四、女子之“难养”？	(283)
五、“远之则怨”？	(286)
六、“近之则不孙 [逊]”？	(287)
七、我的“自由”	(290)
八、异性（与）他者	(293)
九、小人能仁吗？	(298)
附录 “礼治”与“法治”	(304)
后记	(317)

绪论：重读孔子

我们欲重读孔子。

然而，我们真有必要“重”读孔子吗？而且，我们真有可能重“读”孔子吗？“重读孔子”这样的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重读孔子是否仅仅是当今世界上某些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或者偶然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在我们之内产生的某种偶然欲望？一个我们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注定是在以孔子为名的文化传统中发现自己的后来者的欲望？换言之，重读孔子的欲望是否只是我们的由于某些历史偶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产生的某种一厢情愿或者心血来潮？或者，我们是否只是想在一个速度迅猛而意义暧昧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特定的（中国的）过去之旧为普遍的（世界的）未来之新？也许，这一欲望还是我们那个压抑不了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倾向的表现？而这就是说，我们走来走去还是走不出自身的思想文化的传统局限性？

一、“重”读孔子

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是否还有必要重读孔子的问题。的确，还有必要“再”读或者“重”读孔子吗？难道孔子还没有被读完吗？而如果我们这里肯定，孔子还没有被读完，如果我们这里肯定，今天仍有必要重读孔子，这又究竟意味着什么？重读孔子是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不可违背的要求吗？如果重读孔子的确是这样要求，那又是谁的要求？谁能如此要求？对我们提出要求？要求我们？

也许，我们其实已经不再有重读孔子的必要？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间，孔子不是已经被无数读者无数次地读过了吗？孔子，或者更明确地说，孔子的《论语》，不是甚至还曾经是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国家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而规定给任何读者的，亦即，规定给任何希望通过这一考试制度而成为这个文化制度的一部分的读者的必读的经典吗？而在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是已经反复听到各种要求与孔子思想或孔子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呼声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或者不可能将孔子永远放进博物馆？我们还能从孔子里读出什么来呢？孔子不是早已溶入中国文化而完全成为或者几乎完全成为这一文化的某种同义语了吗？孔子不是早已在无数的阅读与诠释中成为中国传统的一个既非常确定又非常复杂的文化象征甚至文化偶像了吗？孔子不是早已被我们“吸收”或者早已被“消化”于我们之中了吗？孔子不是早已“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了吗？孔子不是早已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了吗？

若就此而言，则无论我们与孔子表面上的“关系”如何，无论我们是热爱孔子还是讨厌孔子还是对孔子无动于衷，无论我们是想真正回到孔子还是欲彻底离开孔子，我们谁又能真正声称自己不是“某一”孔子的继承者或者孔子的“某种”继承者呢？孔子就是这样与我们难解难分。而这也就是说，与中国文化难解难分。尽管我们今天也许很少直接想到孔子和孔子说过的话，尽管我们今天说话写作时引用文化或者思想权威以支持自己的方式已经很少再是那个传统的“子曰”了。相反，为了使我们今天的说话写作具有理论基础和权威面貌，我们早已绝对倾向于引用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权威：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可能还要再加上拉康，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等等。我们如今似乎是亟需一些来自我们自己的传统之外的权威的他者或者他者的权威以肯定我们自己，亦即支持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的认同活动。

然而，在我们的这一倾向于诉诸“西方权威”的现代说话写作方式中，我们所能发现的其实也许仍然还是某种变形了的“子曰”。这就是说，我们的说话写作的基本模式其实也许尚未发生我们所相

信的那种根本性变化。我们，作为孔子的后来者，其实可能仍然习惯于某种“子曰”，仍然生活在某种“子曰”的传统之内，或者仍然习惯于某种孔子式的“述而不作”。只是这里被引为权威的“子曰”在表面上似乎已经不再是“孔子”的“子曰”而已。不再是孔子之“曰”则可能是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似是因为，我们也许觉得，孔子这里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留给我们了。我们需要新：新的刺激，新的教导，新的思想，新的理论。而“新”只能来自另一个人，来自他者，来自我们所遭遇和欢迎的他者。而孔子，这个似乎已经在我们自身之内的孔子，还能说是我们的“他者”吗？难道孔子不是似乎早已与我们成为“一体”了吗？在他者的文化或者在我们的文化他者面前，难道我们不正是以某种与孔子“一体”的文化面貌而出现吗？难道中国不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或者理解为主要是一个儒教文化而非道教或佛教文化吗？而所谓“儒教”在西方语言里正是通过在孔子的拉丁化译名 Confucius 后面再加上表示“主义”的后缀 - ism 构成的。“儒教”在生活于这些欧洲语言文化传统的人的眼中就是“孔子之教”。因此，情况似乎是，如果我们只想在孔子中寻找某些“新”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只想以这些“新”东西去服务于某种外在的文化目的，例如，在某种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竞争和保存自己的某种文化认同，那么孔子这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能让我们激动并从而激起我们的重读欲望了。既然有那么多新的东西在我们“前面”等待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似乎已经被读得烂熟甚至已经被读烂了的孔子？

然而，如果即便如此，我们今天却仍然可能为某种重读孔子的欲望甚至激情所支配，并且已经屈从于这一欲望或者激情，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这一“支配”与“屈从”现象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一解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有关我们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想遗产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我们需要重读孔子也许首先只是因为，作为后来者，我们仍然而且始终对这一传统和遗产负有无可推卸的某种伦理责任。这一责任来自他者，来自已经逝去的、已经成为传统的、已经作为传统而

存在着的他者。所以，正是我们的传统本身可以而且始终在要求我们的重读。面对这一要求，这一召唤，一个传统的召唤，一个继续召唤着的传统，我们无法回避。所以，如果我们需要重读孔子，那么这首先只能是因为，我们其实始终已经被要求——被孔子，被作为传统的孔子和以孔子为名的传统所要求——去重读孔子。这一来自他者的无可拒绝的要求始终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然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已然被传统完全束缚，如果我们真能知道这一“传统的束缚”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话；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自觉地承担起这一来自他者的责任。只有在自觉地接受这一要求之时，我们才真正开始负责地面对我们“面前”的一个他者——孔子，一个作为他者的孔子。而他者，正是他者，也只有他者，才是真能够有以教我者。孔子不是早已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7/22)^① 他人才是我之师。而孔子正是不止一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之师。因此，欢迎他者的到来，向他者敞开自己，也就是将自己向作为师的他者的教导敞开。因此，重读孔子就是将我们自己向孔子这一他者真正敞开，从而欢迎这一他者的思想的（重新）到来，欢迎这一他者对我们的（重新）教导。而只有在对于他者的这一欢迎之中，我们才可以期待某种真正的新的到来。因为新只可能产生于我们与他者的遭遇之中，而不可能仅仅产生于我们自身之内。而新当然与未来密不可分。没有真正的新就没有真正的未来；没有真正的未来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新。作为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新与未来者，作为仍然可能给中国文化带来某种新与未来者，孔子仍然在那里在我们“前面”或者我们“面前”——等待着我们。

而这正是我们与传统的复杂关系。传统，真正的传统，从来都是在我们“面前”而不是在我们“身后”。因此，按照某种“传统”的说法，我们其实还远没有真正完成“消化”和“吸收”传统的任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除特别注明者，本书中所引自《论语》者皆出于此书，并将仅于引文后用加括号的形式注明引文的篇章。

务，还远没有真正完成“消化”和“吸收”孔子的任务。我们还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消化”和“吸收”孔子。这一不可能消化和吸收不是任何事实上的，不是由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决定的，而是结构性的。真正消化和彻底吸收他者意味着化他者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让他者与我们完全成为一体，从而让他者在我们之内完全消失。但是，这样的消化和吸收可能既是对于他者的最大的尊敬，也是对于他者的最大的不敬。因为，一旦他者被我如此消化和吸收，他者就不再能作为他者而存在，因而也就不再真正有他者了。这样，他者的消化与吸收就既是他的某种“永久保存”，也是他的某种“彻底遗忘”。当我们真正消化和吸收了他者——他的思想，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与作为他的他的关系其实就“完（成）/结（束）”了。所以，一旦我们真正彻底消化和吸收了我们传统的时候，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也就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传统了。^①

因此，出于我们对于他的真正的尊敬，并且，为了让他者存在，为了让他者继续作为他者而存在，我们必须不能试图去“消化”和“吸收”他者，一个作为传统的他者和一个作为他的传统。如果这就是我们与所谓文化传统或者思想遗产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因此而必然不无“暧昧”的关系。传统并不是我们的纯粹的“认识对象”。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因而也并非一种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互相外在的关系。相反，我们必然始终都已经置身于传统之内了。所以，一方面，作为必然的后来

① 就此而言，就象我们与一切他人的关系一样，我们跟传统的关系也可以从哀悼的角度来理解。哀悼总是对与我们有关的、我们所爱和尊敬的某一已经逝去的他的哀悼。我们的“人之常情”似乎当然是希望总有一天能结束哀悼。但是哀悼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却又意味着他的被吸收/遗忘。所以，为了让他者继续“存在”，我们不应结束哀悼。反之，他者只要作为他者就让我们无法结束哀悼。就此而言，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结束我们对于传统的某种哀悼。但是这一哀悼应该在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上被理解。参考第三章“重读‘孝悌为仁之本’”中围绕孔子关于居丧守孝的思想而展开的有关对他的哀悼的讨论。

者，我们注定只能在传统中发现我们自己。而这也就是说，在他者“之后”发现我们自己。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在他者之后发现我们自己”同时也将是：发现他者始终已经在我们“面前”，发现我们自己始终已经在面对他者。当我们面对传统时，我们是在面对他者。面对传统就是面对他者。正是他者才能让我有责。而这一责任正是我对他者所负有的伦理责任。因此，作为始终已经被抛入某一传统者，作为一个传统中的必然的后来者，我们始终已经对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或者思想文化遗产负有责任，尽管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尽此责任。传统要求我们对之和为之负责，而我们对于传统的责任就是不断重新面对我们的传统。这一重要的面对则只能发生在我们对传统的不断重读之中，并且就作为我们对于传统的重读而发生。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感到真有必要重读孔子的话，那么，这一必要存在于我们对于作为他者的孔子的责任之中。正是永远不可能被我们完全彻底消化和吸收的他者仍然在那里，仍然在我们前面和面前责成我们，所以我们才仍然有重读的必要，亦即，重读孔子的必要，重读我们整个传统的必要，尽管我们也许从来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种消化和吸收他者的倾向。所以，重读并非只是完全来自外在偶然因素的刺激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产生于我们自己之内的一时冲动或者个人癖好，而是首先来自他者的要求。重读首先是他者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他者赋予我们的责任，一个我们对于他者所负有的无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已经逝去的、作为传统的他者仍然在那里召唤我们。在那里召唤我们的他者即要求我们对之做出反应。而只要我们对之做出反应，只要我们回答他者的召唤，那么，无论我们的反应和回答是什么，这一反应和回答中都已经蕴含着对于他者的一个最根本的应许和承诺。只要我们对他者做出反应，我们就已经开始对他者做出应

许和承诺。^① 而如果我们不可能不回答他者，不可能不对他者做出反应，那么我们也不可能不对他者做出这一最根本性的应许和承诺。这就是我们与作为传统的他者或者作为他者的传统的关系的的最深层面。这样一种关系从根本上说首先必然只能是肯定性的关系。而这就是说，无论我们对传统说什么，我们对传统本身做出的反应本身就已经是对传统的肯定，而这一肯定必定是一个最原始最根本的肯定。对于传统的任何具体的特定的肯定都必然蕴含这一根本性的肯定，对于传统的任何否定也必然蕴含这一肯定。没有这一最根本最原始的肯定就不可能有我们与他者的任何对话，或者我们对传统的任何继承。

然而，这一传统或遗产虽然要求我们继承，但是又必然以某种方式抗拒被“消化”和被“吸收”。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抗拒，我们才始终会仍然“有”传统或“有”遗产，于是也始终会有继承亦即重读这一传统或遗产的必要。传统就这样将我们铭刻在一个既完全必要但又永远不可能“彻底”或“最终”完成的责任——一个对于他者的无可推卸的伦理责任——之中。^② 所以，一方面，虽然正是已经成为传统的他者要求我们重读，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传统又必然将我们置于某种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重读任务的处境之中。例如，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对孔子的仁的重读了吗？我们已经“消化”和“吸收”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了吗？难道孔子的仁不是仍然在那里同时既吸引着又抗拒着我们的阅读吗？孔子就好像仍然是在那里对我们说，理解我说的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重读‘克己复礼为仁’”中围绕“应”字展开的有关我对他者的反应的意义的具体分析。

② 的确，儒家传统非常明确地要求我们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用《中庸》里的话说，超越了狭义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孝意味着“善继人之志，善述任之事”。因此，承担起我们对于那些存在于传统之中的、作为传统而存在的他者的这一责任就是我们对于已经逝去的他人的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所欲做的首先乃是按照这一传统本身的要求来对待这一传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就是我们能对这一传统的最大尊重。参见第三章“重读‘孝悌为仁之本’”。

这个仁吧！你们能吗？^① 这就是他者对我们的某种双重要求或者双重约束：我们必须重读；我们不（可）能读完。是以，如果我们仍然有必要重读孔子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的重读必然是不完全的和有限的。这一不完全和有限不仅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时间（生命）和能力的有限，亦即不仅是因为我们必死，而且也是因为，任何阅读都必然要求更多的阅读。也恰恰因为是这样，“全面”或“完整”的阅读将不是我们这里所追求的目标。相反，在对孔子的重读中，我们将满足于从某个“一以贯之”的问题出发而开始我们与孔子的“对话”。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作为他者的孔子仍然在要求我们的重读，那么这一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让我们署名的要求。阅读是署名。正是孔子在要求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又一次）署在已经署满无数其他读者的名字的《论语》之上。作为孔子思想的最集中的体现，作为文化经典，《论语》要求这样的读者署名。这样的署名首先是一个肯定：是的，我已经以某种方式读过你了；是的，我在此以我的署名肯定我的阅读。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经典文本，《论语》就存在于这样的不断的署名活动之中。如果没有这些署在孔子的名字之后的读者连署，孔子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又能是什么呢？一部《论语》对于我们来说又能是什么呢？但是，如果这样的不断的读者连署是必要的，如果《论语》，就象其他一切作品一样，只能存在于这样的连署活动之中，那么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这样的署名必然永远都是未完成的。

① 但这并不是说，孔子有意让他的思想难于理解。孔子明确地说，他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已经公之于他人的。作为师他已经将他所能传授的都传授了：“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7/24）而阅读的任务则恰恰在于，虽然一切都被说出了，一切都已经公开了，一切都已经（以文本的形式）在那儿了，但是就在这已经说出、已经公开、已经存在于文本中的一切之中仍然还有“秘密”。或者说，被说出和被公开的一切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正是需要阅读去“破（译）（理）解”的“秘密”本身。所以才需要阅读。

甚至包括孔子自己的名字。^①而且，不仅孔子要求我们署名，我们之前的那些孔子的读者也要求我们的署名。传统也许就存在于这样的不断署名之中。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连续的署名活动而存在：一个作为署名的不断重读或者一个作为重读的不断署名。所以，在传统上署下我们的名字乃是我们的伦理责任，而绝非自负或者狂妄。为了让传统继续作为传统而“传”其“统”，我们必须重读，必须署名。这样的署名因而不是攀圣附贤，更非沽名钓誉，而是承担责任，承担一个我们对于他者所负有的无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同时，从上述所讨论的署名问题这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毫无遗憾地放弃对于某一“本来”的孔子或者某一“原版”的《论语》的刻意追求。如果有《论语》的话，《论语》其实也许就只存在于这样的读者——作为孔子言行的记录者、编纂者、注释者、评论者的读者——的署名之“间”。这里我们还可以而应该再加上来自其他语言文化的读者：《论语》的翻译者、评论者、研究者等等。《论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数这样的读者的阅读的“产物”。试想，如果没有那些记录孔子话语和言行的人，尤

① 署名是对作品的肯定。作者之署名是作者肯定自己为作品的作者。但是作者的署名必然要求读者的连署。没有这样的读者连署的作品，作者的署名就是“不完全”的。这是德里达所提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点。参见 Jeffrey Bennington 在 *Jacques Derrida*（与德里达合著）中对德里达这一观点的简明扼要的描述和分析（Jeffrey Bennington: *Jacques Derrida*, Jeffrey Bennington 译,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第 148—166 页，尤见第 162—166 页）。的确，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根本没有读者连署的作品，因为这样一个作品其实还无所谓作品。完全被“藏之于名山”的作品在其没有“出山”以前与传统无关，因为它尚未被任何读者阅读和连署，所以也不属于任何传统。就此而言，传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署名活动。没有这一署名活动就没有任何所谓“传统”。因此，作者的署名在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意义上要求读者的连署。在逝去的他者的作品上署上我们自己的名字，这就是说，肯定我们的阅读，正是我们对逝去的他者（作者）的伦理责任。就《论语》情况而言，我们所面对的这一署名问题更为特殊。《论语》并不是孔子自己的亲笔“作品”。孔子并没有在《论语》上“亲自”署上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因而始终已经是由他人代署的。因此，阅读《论语》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就是代孔子署名。

其是孔子的那些弟子们，我们又怎么可能有一部流传至今的、作为“孔子言行录”或者“孔子对话录”的《论语》呢？然而，在具体的口头言论和对话到书写下来的文字之间，已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距离，某种也许甚至使孔子本人都有可能在这些文字中认不出自己的距离。所以，如果我们真想追求真正的纯粹的“原版”《论语》的话，我们也许就得放弃阅读《论语》的任何希望，因为孔子自己也从来没有能在《论语》上“亲笔”署下他的名字以认可对于他的话语的记录。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妨碍《论语》以孔子之名作为一个文本来到我们面前。于是，重读孔子就是面对《论语》这一文本，一个已经在我们前面所谈论的意义上被反复读过的文本，一个已经为无数阅读所“加工”过的文本。我们所能依据和依赖的首先就是这一文本。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我们尊重我们前面的无数读者对于《论语》所做的大量考据分疏注释的工作，我们尊重并且借重这些工作。但是，既然我们的目标主要不是文本的考据，所以我们将必然只能在以前读者的基础之上展开我们的阅读。

最后，如果我们的传统要求我们对之并且为之负责，如果重读传统是我们的伦理责任，如果我们的重读因而首先是承担我们对他的者的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那么这一承担责任同时必然也是欲使中国文化这一特定传统在面对其他文化之时，亦即，在面对文化他者之时，负起自己对于其他文化或者文化他者的责任。这一责任则恰恰正是：必须在其他文化或者文化他者面前坚持、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一坚持、继承和发展既非意味着完全回到自身和自我封闭，也不是欲使自己在某种文化竞争中占据上风 and 击败对手。相反，所谓坚持、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已经蕴含着与文化他者的必然的遭遇和面对，因此也已经蕴含着对于文化他者之作为他者的承认和尊重。没有这一遭遇和面对就还无所谓任何“（对于）传统的意识”的觉醒，因而也就还无所谓任何真正的、自觉的传统。传统，作为文化自我认同的活动和过程而非原始的自我同一的整体，始于与他者的遭遇。传统作为传统因此始终已然向他者敞开，始终已然在欢迎他者的到来，始终已然在自身之内“招